

西汉文章论稿

◎ 王琳 著
◎ 邢培顺



齊魯書社

西汉文章论稿

◎ 王琳
◎ 邢培顺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汉文章论稿 / 王琳, 邢培顺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6. 10

ISBN 7-5333-1687-8

I. 西... II. ①王... ②邢... III. 古典散文—文学—研究—中国—西汉时代—文集 IV. I207.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1701 号

西汉文章论稿

王 琳 邢培顺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32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390 千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33-1687-8/K · 522

定 价: 31.00 元

前言

汉代文章创作成就相当突出,备受后世推重,乃至于有将唐诗、晋字、汉文并称者。就两汉文章大体比较而言,东汉作品在气势、力度与感情的投注及行文的挥洒自如上逊于西汉,但对辞采、骈俪等形式美的重视与追逐的风气则比西汉愈益普遍、浓重,用王符的话说,就是“争著雕丽之文”,从而对六朝骈文的成熟及兴盛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所以后世如韩愈、柳宗元等倡导古文排斥骈体文者,在汉文中推崇的是西汉文。韩愈《答刘正夫书》云:“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所称四位为文之最者皆西汉人。柳宗元《〈西汉文类〉序》云:“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殷周之前,其文简而野;魏晋以降,则荡而靡。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既衰矣。”直称东汉文已呈衰势。另一方面,某些站在认可骈体文的立场上的人物,则并不轻视东汉文,如刘勰《文心雕龙》对东汉文章评价颇高;清人李兆洛所编《骈体文钞》,收录班固、蔡邕等东汉作家的文章显然更多一些。撇开骈散之争的思维框子,应该说,西汉、东汉乃至魏晋、南北朝历代作家的文章是各有所长的,它们如群星璀璨,共同造就了彼时文坛的繁荣气象。

与诗赋相比,当今学术界对汉魏六朝文的重视程度较为薄弱,研究成果往往集中于司马迁等少数几个作家。有鉴于此,我们这些年多将时间与精力投于汉魏六朝八百年文的研究,涉猎较为广泛。现将关于西汉文的研究成果勒为一集出

版,名为《西汉文章论稿》。汉魏六朝时期广义的“文章”包括奏议、子论、史传、书信、辞赋乃至诗歌等,如班固《汉书·公孙弘传赞》:“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文章则司马迁、相如。”陆云《与兄平原书》:“云久绝意于文章,由前日见教之后,而作文解愁,聊复作数篇,为复欲有所为以忘忧。”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萧统《〈陶渊明集〉序》:“其文章不群,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本著所论述对象限定于诗赋以外的文,故书名之“文章”乃是狭义称谓,其含义大略相当时下所谓“散文”。谨此说明。

除《史记》研究这个热门领域论著纷呈外,前已流行的较多关涉西汉散文的研究论著,主要有郭预衡先生《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漆绪邦先生主编《中国散文通史》(吉林教育出版社版),韩兆琦先生《汉代散文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版),熊礼汇先生《先唐散文艺术论》(学苑出版社版),赵明先生等主编《两汉大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版),这些著作涉及西汉散文作家或十几人,或二十几人,相关论述详略不等,篇幅或几万字,或十几万字,不同程度地为本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本论稿专门以西汉文为解读对象,试图在前贤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开拓发展。约略言之,其一是加大作者群的覆盖面。韩愈称“汉朝人莫不能为文”,语虽不免夸张,但其时能文者之多超越前代也是事实,故尽可能多地挖掘有关能文者的创作活动,无疑是接近并揭示其时文坛真实状况的重要且有效之途径。本书共论及西汉各层次文家近六十人,篇幅则相应升至四十万字,以期尽量描述二百三十年间散文创作的丰富性、多样性,注重群体文风的衍变,以及形成某一群体之若干个体创作的主题取向与文风差异的比较。其二是加强对彼

时铺采摘文的主流文体辞赋之于文风的影响、渗透,文本折射的时代气象及其文化意蕴等现象的探索,以凸显天汉声威、浪漫自信、赋体扩张、儒学昌明诸社会文化气氛。其三是强化文本的艺术分析,及其在所属文体发展史上之意义的定位,比如贾谊之于奏疏的激情洋溢、刘恒之于诏令的谦和诚恳、韩婴之于说经体著述的故事化、张騫之于域外记兴起的推动,等等。其四是注重对作家为人个性与文风关系的考察,以及对某些作品真伪问题的考辨。在撰写过程中,我们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对有关内容,前人所详言,我们则略言之;前人所略言,或未言,我们则详言之。本稿十篇文字,第一、二、五、六、七等五篇主要由王琳撰写,第三、四、八、九、十等五篇主要由邢培顺撰写,最后由王琳审定全文。

本书出版过程中,得到齐鲁书社领导的大力支持,责编刘海军、张文同志一丝不苟,付出辛勤的劳动,我们谨表衷心的感谢。

王 琳 邢培顺

2006年5月2日

目 录

1/前言

1/西汉初期京都士人文章论

52/西汉初期向中期过渡之藩国君臣文章论

88/韩婴之《韩诗外传》论

134/董仲舒文章论

160/西汉中期前段士人群文章论

239/司马迁《史记》论

272/西汉中期后段士人群文章论

311/西汉后期士人群文章论

342/刘向三书论

424/严遵与扬雄文章论

452/参考文献要目

西汉初期京都士人文章论

经过农民起义洗礼而建立了新的封建王朝的西汉初期统治者,为矫秦弊政、稳定社会,先后废除了挟书律及诽谤、妖言之法,并采取举贤良对策、下诏求言等方式,鼓励士人指陈朝廷政治之阙失。在此较为宽松的时代气氛中,陆贾、贾山、贾谊、晁错等一批继承战国诸子传统的政论作家应运而生,他们本着“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变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应时”(贾谊《过秦论》)的思想原则,以兼采诸子学说的广博胸怀及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总结秦王朝迅速崩溃的经验教训,为汉王朝的巩固及长治久安出谋划策,陈古论今,畅所欲言,其文章或激情洋溢,或峻洁沉实,揭开了汉代政论文辉煌的序幕。以文帝为代表的君主诏令,往往写得谦和诚恳,作为此风格的典范文本,颇为后世称道。

—

汉初的知名散文作家以陆贾为最早。陆贾,楚人,生卒年不详。初事刘邦,以能言善辩著称,常使诸侯。高祖十一年,说服南越王赵佗臣属汉朝,归,被任为太中大夫。吕后专权,病免家居,后参与诛灭诸吕。文帝时,复使南越,劝说自称南越武帝

的赵佗取消帝号^①，归，以寿终。著有《新语》十二篇，今存。还有《楚汉春秋》九篇，赋三篇，今佚。又，清人潘耒《遂初堂集》卷七《使粤日记序》有云：“夫陆贾南中之记，不妨与《新语》并传，放翁入蜀之编，由来与《渭南》比美。”据这段话的意思，陆贾还曾撰过《南中记》，此书未见于《汉书·艺文志》及《隋书·经籍志》等史志著录，更未流传下来。但今存西晋人嵇含（263—306）所撰《南方草木状》有两处文字引及此书，题为《南越行记》。^②笔者浅陋，再未见有他书征引者。是陆贾撰，还是后世假托，殊难断定。谨此存疑。

作为汉朝建立之初卓有成就的能文之士，陆贾在著述方面的成就受到人们广泛的肯定。东汉前期王充《论衡·书解》将其与西汉几大文家相提并论，云：“汉世文章之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扬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称不由己。”《论衡·案书》又云：“《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与王充同时期的班固在其《答宾戏》中亦将陆氏与西汉几大文家并列，赞美他们的著述之功云：“近者，陆子优游，《新语》以兴。董生下帷，发藻儒林。刘向司籍，辨章旧闻。扬雄覃思，《法言》、《太玄》。皆及时君之门闾，究先圣之壶奥，婆娑乎术艺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圃，以全

① 后人颇景仰陆贾之不辱使命的杰出素质，如曹植《请招降江东表》云：“若陛下遣明哲之使，能继陆贾之踪者，使之江南……（孙）权必奉圣化，斯不疑也。”

② 《南方草木状》卷上：“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陆贾《南越行记》曰：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缘自胡国移至，不随水土而变，与夫橘北为枳异矣。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卷下：“杨梅，其子如弹丸，正赤。五月中熟，熟时似梅，其味甜酸。陆贾《南越行记》曰：罗浮山顶有胡杨梅，山桃绕其际，海人时登采拾，止得上饱啖，不得持下。”见《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第256、2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其质而发其文，用纳乎圣德，烈炳乎后人，斯非亚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战国至西汉赋作，分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荀卿赋之属、杂赋之属四类，各统隶多家作品，陆贾俨然为其中一类之初祖。孔融《上书荐谢该》：“臣闻高祖创业，韩、彭之将征讨暴乱，陆贾、叔孙通进说《说》《书》……故能文武并用，成长久之计。”突出了陆贾在“文”的方面的重要作用。齐梁之际大文论家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亦云：“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其《才略》还兼及陆氏赋作与子书著述之不凡成就，云：“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进《新语》，其辨之富矣。”此外，陆贾《楚汉春秋》九篇，是西汉初期少有的当代史名著。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云：“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迄于大汉。”刘知几《史通·杂说》云：“刘氏初兴，书唯陆贾而已；子长述楚汉之事，譬夫行不由径，出不由户，未之闻也。”据此记载，可见陆贾《楚汉春秋》为司马迁《史记》之相关部分所依据，于中国史学，厥功伟矣！王利器先生《新语校注》附录洪颐煊所辑《楚汉春秋》佚文，由此可见陆氏长于捕捉有关人物言行，书中记载不乏简洁生动之处，具有史家的撰作素质。惜乎其书不存，我们不得窥其整体风貌。

当今陆贾著述唯有《新语》存世，性质属于诸子类著述。其著述本末，《史记·陆贾传》有扼要记载：陆贾经常在刘邦面前说称《诗》、《书》，有一次遭到刘邦“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的责骂。陆贾反驳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不卑不亢，引史为喻，凸显了自觉而强烈的人文信念。致使不学无术的刘邦感到惭愧，对陆贾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于是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刘邦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

岁,号其书曰《新语》。

汉人的著作流传到后世,在经历了自然的选择和一次次天灾人祸的大劫难后,本来所剩已经不多,还往往牵涉完缺和真伪的问题,让后世学人因此而打许多的笔墨官司,陆贾的《新语》也牵涉这样的情况。

《新语》为陆贾所创作,这一点古今没有疑义,但流传到后世的《新语》是不是陆贾的原作,后世的人们便产生了疑问。陆贾的《新语》,自《史记》、《汉书》以至《崇文总目》,都有明确的记载,在其他各类学术著作中也多有引用和论述,所以直到北宋时期,没有人对传世《新语》的真伪问题提出疑问。怀疑传世的《新语》非陆贾原本的争议,是到南宋时期才产生的。南宋元明时期,有些学者认为,传世的《新语》是贗品,非陆贾原作;有些学者则认为,传世《新语》的一些篇章是后人增补的。他们的根据有二:一是《新语》的文章风格;二是《新语》在流传过程中曾经严重残缺。

关于第一种意见,黄震《黄氏日钞》卷五十六在概述了《新语》各章的主要内容后说:

然其文繁细,不类陆贾豪杰士所言。贾本以《诗》、《书》革汉高帝马上之习,每陈前代行事,帝辄称善,恐不如此书组织以为文。又第五篇云:“今上无明王圣主,下无贞正诸侯,锄奸臣贼子之党。”考其上文,虽为鲁定公而发,岂所宜言于大汉方隆之日乎?若贾本旨谓天下可以马上得,不可以马上治之意,十二篇咸无焉,则此书似非陆贾之本真也。

对传世《新语》是否陆贾原本提出怀疑。明人闵景贤在《纂诸子斟淑〈新语〉题辞》中也说:“西汉陆贾,号为有口辩士,今所传《新语》,乃和雅典则,与汉初文气不类,疑东汉人贗作。”通观黄震的怀疑理由,主要有三点:其一,其文繁细,不似陆贾之言。此点不足为

据。陆贾虽号称有口辩士，^①然他不纯然以纵横辩说为能事，而更像一个熟悉儒家经典、具有儒家色彩的洒脱的书生。其二，陆贾时时称《诗》、《书》以谏说高祖，而《新语》书中却对《诗》、《书》少有称引。此点更不足据。刘邦集团的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而且他们所注意的是现实政治问题，所以陆贾要说动高祖，就只能依据《诗》、《书》的精神，结合当前的形势，用浅显的语言，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措施。其三，陆贾既述天下可以马上得不可以马上治之意，而“十二篇咸无焉”。此点不确，陆贾《新语》通篇所阐说的正是安定百姓、仁义治国的道理。

关于第二种意见，南宋王应麟《玉海》中说：“今存于世者，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资质、至德、怀虑，才七篇。”于是有人怀疑《新语》“盖宋时佚而复出，出亦不全”。至明朝时，却又有十二篇本行于世，于是有人进而怀疑此“是后人因不全之本，补缀五篇以合本传篇数”。宋朝经过靖康之变，典籍流散，《新语》的一些传本，也有残缺现象发生，王应麟只见残本而未见全本，即以为《新语》已经缺佚五篇，实则《新语》并非全部缺损，因为与他同时的黄震所见即是全本。

① 《汉书·酈陆朱刘叔孙传》载陆贾在高祖时出使南越，说服南越首领赵佗臣属汉朝，其说辞分析形势，明辨利害，较量短长，滔滔汨汨，口若悬河，颇显纵横策士风神，有云：“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诸侯豪杰并起，唯汉王先入关，据咸阳。项籍背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矣。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诸侯，遂诛项羽。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闻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史。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于此。汉诚闻之，掘烧君王先人冢墓，夷种宗族，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即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众不过数万，皆蛮夷，崎岖山海间，譬如汉一郡，王何乃比于汉！”

至清代四库馆臣修《四库全书》，又提出了多条理由来证明传世的《新语》为后人所作。其主要理由如下：(1)据《汉书·司马迁传》，“迁取《战国策》、《楚汉春秋》、陆贾《新语》作《史记》”，而《新语》之文，“悉不见于《史记》”；(2)王充《论衡·本性篇》引陆贾之语，不见于今之《新语》；(3)《穀梁传》至汉武帝时始出，而《新语》竟引穀梁说、用穀梁义。对于这几点，余嘉锡在其《四库提要辨证》中都作了有力的反驳。关于第一点，余嘉锡认为，这是四库馆臣误信了高似孙《子略》中的说法而得出的结论，因为《汉书·司马迁传》并无司马迁取《新语》之文作《史记》的说法。关于第二点，余嘉锡认为，《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载有陆贾二十三篇，则陆贾著作自不限于《新语》，《论衡》所引之语，称“陆贾曰”而不称“《新语》曰”，或是陆贾其他论述中之文。关于第三点，余嘉锡认为，据《汉书·儒林传》，“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鲁申公受学于浮丘伯，而浮丘伯为荀卿门人。陆贾为楚人，且又与浮丘伯同时，在《新语》中，陆贾也曾称扬浮丘伯之高节，则陆贾之熟悉《穀梁春秋》，不仅不奇怪，反显得合情合理。由此看来，四库馆臣对于《新语》的怀疑，是站不住脚的。由于《四库全书总目》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影响，后世有些人便认为它是伪作，不过大多数学者仍相信它的真实性。如唐晏在其《陆子新语校注跋》中即说：“陆氏此书，见于汉唐志及《崇文总目》，流传有序，决无可疑。”从《新语》的文章内容及其在历代典籍中的载录情况来看，今存《新语》为陆贾原作无疑，不过由于时间的久远，语言文字有讹脱舛误，后人对字句有所增补润饰是可能的。

《新语》的思想体系以儒家为显著，其中流露的倾向是崇尚仁义，高扬德治，这与司马迁的记述颇为合拍。陆贾认为，道德、仁义是政治的根本：“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新语·本行》，以下引此书，只注篇名）；道德、仁义也是建立长治久安、和谐有序之社会的保障：“圣人怀仁仗义，分明纤微，付度天地，危而不倾，佚

而不乱者，仁义之所治也”（《道基》），“圣人居高处上，则以仁义为巢……德配天地，光被八极，功垂于无穷，名传于不朽”（《辅政》）。在此正面立论的基础上，陆贾着重从反面总结了秦王朝之所以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其速亡的主要原因是迷信严刑酷罚，践踏、废弃仁义：“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辅政》），“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道基》），“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无为》）。陆贾认为，不能用贤去佞，是秦王朝速亡的又一重要原因：“以李斯、赵高为杖，故有倾仆跌伤之祸，何者？所任非也”（《辅政》），“忠贤之士弃于野，则佞臣之党存于朝；佞臣之党存于朝，则下不忠于君；下不忠于君，则上不明于下；上不明于下，是故天下所以倾覆也”（《资质》），还以赵高指鹿为马事为例说明邪佞的惑君误国（《辨惑》）。陆贾还指出秦始皇等统治者“骄奢靡丽，好作高台榭，广宫室”，天下豪富纷纷仿效，大兴土木，“疲百姓之力”，“以极耳目之好，快淫侈之心”（《本行》），以致民怨沸腾，铤而反抗，这也是秦王朝覆灭的一个原因。赫赫嬴秦，不可一世，却落了个剧灭的命运，原因何在？不仅为陆贾之类思想家特别关注，亦为刘邦之类新起的统治者特别关注，故陆贾《新语》中多篇涉及对秦所以亡之问题的议论，从而真正开启了此后贾谊为代表的“过秦”理念的先河，其卓识宏议，是颇具思想文化意义的。

陆贾在高扬儒家仁德政治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有选择地吸收了其他学派的思想，尤其是黄老道家贵柔及清静无为等思想，如：“故怀刚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长，躁疾者为厥速，迟重者为常存，尚勇者为悔近，温厚者行宽舒，怀急促者必有所亏，柔儒者制刚强”（《辅政》），“夫刑重者则心烦，事众者则身劳；心烦者则刑罚纵横而无所立，身劳者则百端回邪而无所就。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不言而信，不怒而威”

(《至德》)，“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无为》)，这种思想适应了汉初休养生息、安定社会、发展经济的时代要求，同时也可使人们从中得知：陆贾不仅是汉代推崇儒学的最早的一位思想家，而且也开启了从其他学派尤其是黄老道家学派中吸收合理成分以充实新时期政治思想体系的先河。

《史记·酈生陆贾列传》说：“余读陆生《新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文心雕龙·才略》说：“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进《新语》，其辩之富矣。”^①钱穆说：“陆贾楚人，《新语》文体，上承荀卿，下开淮南，颇尚辞藻。荀屈同为赋宗，盖荀卿曾南游楚，而染其文风耳。”^②作为汉初一位“首发奇采”的作家，陆贾可谓集辩士、辞赋家、政论家于一身，这几种素质的有机糅合，造就了《新语》的风格特色，它像辞赋般讲究谐韵、整饬，富于铺陈、比喻，又有纵横家说辞的浩荡气势，^③如：

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故曰：张日月，列星辰，序四时，调阴阳，布气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阳生雷电，阴成雪霜，养育群生，一茂一亡，润之以风雨，曝之以日光，温之以节气，降之以殒霜，位之以众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罗之以纪纲，改之以灾变，告之以禎祥，动之以生杀，悟之以文章。故在天者可

① “进《新语》”或作“选《典诰》”，王利器《新语校注》附录三：“‘选《典诰》’当作‘进《新语》’，《诸子》篇之‘陆贾《新语》’，本亦误作‘陆贾《典诰》’。”其说是。

②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三，第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③ 姜书阁先生《骈文史论》：“陆贾《新语》，实全用骈用韵，无异于赋……也有敷衍铺陈，引喻譬况，富丽浩荡之章。”第144—1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见,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纪,在人者可相……是以君子握道而治,据德而行,席仁而坐,杖义而强,虚无寂寞,通动无量。故制事因短,而动益长,以圆制规,以矩立方。圣人王世,贤者建功,汤举伊尹,周任吕望,行合天地,德配阴阳,承天诛恶,克暴除殃。

（《道基》）

立事者不离道德,调弦者不失官商,天道调四时,人道治五常,周公与尧舜合符瑞,二世与桀纣同祸殃。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故良马非独骐骥,利剑非惟干将,美女非独西施,忠臣非独吕望。今有马而无王良之御,有剑而无砥砺之功,有女而无芳泽之饰,有士而不遭文王,道术蓄积而不舒,美玉韞椟而深藏。故怀道者须世,抱朴者待工,道为智者设,马为御者良,贤为圣者用,辩为智者通,书为晓者传,事为见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

（《术事》）

徐复观先生针对此种文风指出:“《陆贾赋》三篇,为汉赋之首。此三赋虽亡,但今日所存的残缺不全的《新语》,因其系分篇奏陈给不学无术的刘邦听的,中间杂有韵语,亦即杂有赋体,以便易于使刘邦入耳。由此以推测陆贾之赋,当系新体诗之赋。”^①这里所谓新体诗之赋,是指与贾谊《吊屈原赋》之类效法屈原的楚辞体(或称骚体)赋相区别的新兴赋体,即一种韵散结合兼具诗文特征的赋体。此种新赋体在汉初的较早的代表作家是陆贾,故刘勰为他加上“首发奇采”的桂冠。从上引《新语》文字来看,应该说这种推测是可以成立的。

《资质》论述人才的遭遇问题,尤具文采。作者认为,人主昏聩,导致贤者弃逐,不才者通显,国家也就难免倾覆的命运;所以,

① 《徐复观文集》第二卷,第40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统治者须体察下情，举贤授能。为了形象地说明人之遇与不遇，作者在开头一大段以榱桷、豫章等树木的不同境况作比喻，即物即人，铺张扬厉，辞藻富丽，近似一篇兴寄型的咏物赋：“质美者以通为贵，才良者以显为能。何以言之？夫榱桷豫章，天下之名木也，生于深山之中，产于溪谷之傍，立则为大山众木之宗，仆则为万世之用，浮于山水之流，出于冥冥之野，因江河之道，而达于京师之下，因斧斤之功，得舒其文色，精捍直理，密致博通，虫蝎不能穿，水湿不能伤，在高柔软，入地坚强，无膏泽而光润生，不刻画而文章成，上为帝王之御物，下则赐公卿，庶贱而得以备器械；闭绝以关梁，及隘于山阪之阻，隔于九岢之隄，仆于崑崔之山，顿于窅冥之溪，树蒙茏蔓延而无间，石崔嵬崭岩而不开，广者无舟车之通，狭者无步担之蹊，商贾所不至，工匠所不窥，知者所不见，见者所不知，功弃而德亡，腐朽而枯伤，转于百仞之壑，惕然而独僵，当斯之时，不如道傍之枯杨。岵岵结屈，委曲不同，然生于大都之广地，近于大匠之名工，材器制断，规矩度量，坚者补朽，短者续长，大者治罇，小者治觥，饰以丹漆，敷以明光，上备大牢，春秋礼庠，褒以文采，立礼矜庄，冠带正容，对酒行觥，卿士列位，布陈宫堂，望之者目眩，近之者鼻芳。故事闭之则绝，次之则通，抑之则沉，兴之则扬，处地榱桷，贱于枯杨，德美非不相绝也，才力非不相悬也，彼则槁枯而远弃，此则为宗庙之瑚琏者，通与不通也。人亦犹此。”《史记》、《汉书》所载陆贾籍贯不详，但皆提及他为楚人，楚为辞赋的发祥之地，陆贾为文受其影响是情理中事。清人文廷式称此节“文似赋颂”，王利器先生也云：“陆贾赋今不可得见矣，读《新语》之文，不啻尝鼎一脔矣。”（《新语校注》，第107页）在汉代，文人著述以他为最早，文章的赋化倾向，应该说也是由他首开风气的。

焦竑《澹园集》卷十二《与友人论文》云：“汉世，蒯通、随何、酈生、陆贾，游说之文也，而宗战国。晁错、贾谊，经济之文也，而宗申、韩、管、晏。”焦氏所陈列汉初两类文及其代表作家，相对而言，